

CATALOG OF BIRD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清宫鸟谱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ATALOG OF BIRD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清宫鸟谱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鸟谱/李湜主编；故宫博物院编.——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8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620-8

I. ①清… II. ①李… ②故… III. ①鸟类—工笔画—花鸟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4019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 季 王亚民
委 员 （按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冯乃恩 任万平 纪天斌 杨长青 余 辉 宋纪蓉
宋玲平 张 荣 陈丽华 赵国英 赵 杨 娄 玮
章宏伟 阎宏斌 傅红展

故宫经典
清宫鸟谱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李 湜
点 校：张圣洁
物种考证专家组：
组长：黄復生 王祖望
组员：刘月英 负 莲 张世义 杨思谅 黄永昭 卢汰春 童墉昌 冯祚建
图片资料：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
摄 影：余宁川
影像提供：周耀卿

出 版 人：王亚民
责任编辑：江 英、王冠良、李子裔
装帧设计：李 猛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12
印 张：46.5
字 数：65千字
图 版：482幅
版 次：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978-7-5134-0620-8
定 价：390.00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淼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的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故宫出版社（原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故宫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

《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这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含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006/	前言
014/	《鸟谱》物种考证纪要
016/	《鸟谱》第五册
082/	《鸟谱》第六册
148/	《鸟谱》第七册
214/	《鸟谱》第八册
280/	《鸟谱》第九册
346/	《鸟谱》第十册
412/	《鸟谱》第十一册
478/	《鸟谱》第十二册
550/	《鸟谱》物种考证
558/	后记、出版后记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ATALOG OF BIRD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清宫鸟谱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鸟谱/李湜主编；故宫博物院编.——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8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620-8

I. ①清… II. ①李… ②故… III. ①鸟类—工笔画—花鸟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4019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 季 王亚民

委 员 （按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冯乃恩 任万平 纪天斌 杨长青 余 辉 宋纪蓉

宋玲平 张 荣 陈丽华 赵国英 赵 杨 娄 玮

章宏伟 阎宏斌 傅红展

故宫经典

清宫鸟谱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李 湜

点 校：张圣洁

物种考证专家组：

组长：黄復生 王祖望

组员：刘月英 负 莲 张世义 杨思谅 黄永昭 卢汰春 童堉昌 冯祚建

图片资料：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

摄 影：余宁川

影像提供：周耀卿

出 版 人：王亚民

责任编辑：江 英、王冠良、李子裔

装帧设计：李 猛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12

印 张：46.5

字 数：65千字

图 版：482幅

版 次：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978-7-5134-0620-8

定 价：390.00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淼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的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故宫出版社（原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故宫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

《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这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含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006/ 前言

014/ 《鸟谱》物种考证纪要

016/ 《鸟谱》第五册

082/ 《鸟谱》第六册

148/ 《鸟谱》第七册

214/ 《鸟谱》第八册

280/ 《鸟谱》第九册

346/ 《鸟谱》第十册

412/ 《鸟谱》第十一册

478/ 《鸟谱》第十二册

550/ 《鸟谱》物种考证

558/ 后记、出版后记

前言

《鸟谱》又称《仿蒋廷锡鸟谱》，共十二册，其第一至四册曾随清宫的大批珍贵文物，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至台湾，目前，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第五至十二册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该《鸟谱》每册的画幅尺寸及装裱形制均相同，即纵41.9厘米，横43.9厘米，为左右对开式。右页绘工笔重彩花鸟画一帧，涉及鸣禽、攀禽、陆禽、猛禽、涉禽和游禽等六个生态类型的鸟，数十个品种；左页以汉、满两种文字书写其名称、形态特征、产地、习性等，并抄录《尔雅·释鸟》^[2]、《诗疏》^[3]、《禽经》^[4]等典籍中的相关著录。在每册画幅的前后均添有纸质的空白副页和1厘米厚的楠木夹板，以防止画心硌伤、受潮等。为了便于保管和取用，在楠木夹板上均阴刻有图名“鸟谱”及该册的序号。其装潢样式具有皇家考究庄重的特点。

该《鸟谱》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介绍了《鸟谱》的概况：“绢本，十二册，每册三十幅。末册三十二幅，纵一尺二寸五分，横一尺三寸。设色画鸟属三百六十一一种，右图左说，兼清、汉书。”^[5]著录还详细登录了每一图册所绘的鸟名，以及乾隆朝重臣傅恒、刘统勋、兆惠、阿里衮、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人所撰写的题跋，跋曰：“右《鸟谱》十二册，为图三百有六十。内府旧藏故大学士蒋廷锡设色本，乾隆庚午春敕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摹绘。并命臣等以国书译图说，系于各帧之左。迄辛巳冬竣事，装潢上呈乙览。”^[6]由此可知，这套本无作者签名和年款的《鸟谱》，是从“乾隆庚午春”即乾隆十五年（1750）春季开始绘制的，直至乾隆“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完成，历时十一年。还可知，这套《鸟谱》是根据内府旧藏蒋廷锡的图本所摹，其摹绘者是乾隆朝画院供奉余省和张为邦。

需要说明的是，在《鸟谱》所绘鸟禽的数目上，《石渠宝笈》续编记：“设色画鸟属三百六十一一种”，傅恒等人在图册上的跋则曰“为图三百有六十”，二者的出入在于一张《额摩鸟图》上。傅恒等人的跋作于《鸟谱》完成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宫中又新进一只额摩鸟，乾隆皇帝视其为珍禽，喜爱有加，不仅专门为此鸟作《十韵诗》^[7]加以歌咏，而且还谕令宫廷画师绘制此鸟。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档》）记：“太监胡世杰传旨：着艾启蒙、方琮用白绢画额摩（摩）鸟一幅。”^[8]又见同年六月《清档·如意馆》记：“首领董五经交额摩鸟图、说四张，传旨着交如意馆裱册页二开，续入在《鸟谱》册页上。钦此。”^[9]《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显然，当时的著录者彭元瑞、金士松、董诰、王杰、阮元等人，将新增绘的“额摩鸟”和乾隆皇帝题该鸟的御制诗亦算在了《鸟谱》之列。

一 《鸟谱》的绘制

这套《鸟谱》始绘于乾隆十五年（1750）。此时的清王朝，在乾隆皇帝多年励精图治的不懈努力下，正步入封建社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兴盛期。国家的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达到十亿亩左右，人口则突破了一亿大关，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先后以武力镇压了四川瞻对地区的暴乱、福建瓯宁老官斋会的起义、大小金川的土司之乱等，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此时的乾隆皇帝仰仗着雄厚的国力，开始有更多的闲情用于出游或关注其皇家园林、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如在十五年二月初二日，他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山；三月，传旨着铸造长春园西洋楼中水法池内用于装饰的铜鹅、铜鸭等。此时，他还计划着从翌年

[1] 1997年10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

[2] 《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三卷二十篇，但仅存《释鸟》、《释草》、《释虫》等十九篇。

[3] 又名《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三国时吴陆玑著，《四库全书》著录。

[4] 旧题春秋时晋国师旷撰，西晋张华作注，为《四库全书》著录。

[5] （清）王杰、阮元等撰：《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891，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下同）。

[6] 同上，第5册，页1893—1894。

[7] （清）爱新觉罗·弘历撰《十韵诗》曰：“嘎拉巴之鸟，其邦觐已难。忽随番舶到，因命绘形看。佛朗机人识，大红海岛攬。具图还具说，惟悉复唯殚。性善弗为猛，喜炎最畏寒。通身毛作绛，垂喙肉标丹。翅秃那能翥，尻髡颇亦安。啄成无翼至，曾匪有心干。世乐休征瑞，古初未纪官。珍禽虽不育，聊作异闻观。”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7册，页131，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下同）。

[9]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7册，页140。

[10]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册，页55。

[1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册，页464。

[1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770。

[13]《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770。

[1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771。

[1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336。

[16]（清）张照等撰：《石渠宝笈》，第1册，第343页。

[17]（清）胡敬：《国朝院画录》，道光二十三年（1843）崇雅堂集本。

开始下江南，于治理水患、收络人心之余，游览从未见过的江南美景，等等。

关于《鸟谱》的绘制，据《清档》记：在余省、张为邦绘制之前，宫中藏有多种鸟谱。雍正元年（1723）《清档·流水档》记：七月初六日，“怡亲王交《飞禽谱》十二册。王谕：着表（裱）册页。遵此”^[10]。雍正五年（1727）《清档·流水档》记：四月初三日，“副总管太监苏培盛将造办处收贮《鸟谱》册页一本呈览奉。上问共有几本？随奏称共有十二本。上谕：着将此册页交出，着慈宁宫画画人内平常手艺人照样画一分。其册页上字着翰林戴瀚写，不要草字，写行书字。钦此”^[11]。通过翻查《清档》发现，在乾隆初年还有谕令给旧《鸟谱》添加对题之事。《清档·如意馆》记有三条：乾隆三年（1738）“五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鸟谱》对题绢三百六十张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交与懋勤殿，着翰林写字。钦此”^[12]。同年的十月十二日，“首领郑爱贵传旨：旧《鸟谱》上着添换对题六十张。钦此”^[13]。十二月初四日，郑爱贵又传旨：“着将旧《鸟谱》上对题换新对题。钦此”^[14]。此外，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清档·如意馆》记余穉也曾摹过一套《鸟谱》：“初七日，副催总佛保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库掌花善押帖一件，内开为：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鸟谱》一册，传旨着余穉照《鸟谱》数目尺寸，用绢画《鸟谱》十二册。钦此”^[15]事实上，余省也曾单独绘过一套《鸟谱》，该套《鸟谱》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余省画《鸟谱》十二册（上等黄一），素绢本，着色画，每册三十幅，每册末幅款云‘臣余省恭画’，下有‘臣’、‘余省恭画’连印。每幅左方，王图炳楷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王图炳奉敕敬书。’幅高一尺二寸五分，广一尺三寸。画册次等。”^[16]嘉庆朝翰林院侍讲学士、《石渠宝笈》三编的编

纂者之一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记，余省的这套《鸟谱》应该绘于他与张为邦合作的《鸟谱》之前，言：“续编有省与张为邦合摹蒋廷锡《鸟谱》，是册殆省先专画，后又与为邦合摹也。”^[17]

上述的《飞禽谱》、《鸟谱》，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蒋廷锡《鸟谱》、余省和张为邦合摹《鸟谱》之间的关系，有待考证。乾隆十五年（1750）春，乾隆皇帝决定对蒋廷锡进呈的《鸟谱》进行临摹，这实际上是皇室对鸟类题材关注的一个延续。

二 《鸟谱》的作者

此套《鸟谱》的原作者蒋廷锡（1669—1732），字南沙，号扬孙，江苏常熟人。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他工绘花鸟，并在与宫内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画技法，故其花鸟画既宗法恽寿平的没骨花鸟，讲求设色施墨，不见笔痕线迹，又参用西洋画法，注重物体的明暗、透视及写实逼真的视觉效果，是康、雍朝重要的词臣画家。蒋廷锡为了展示自己政治才能之外的艺术才华，曾经不断地向朝廷献上署有其名款的画作，仅被皇家内府编纂的《石渠宝笈》著录的就有七十一件（套），其中以图谱的形式敬献的大型画册，除《鸟谱》外，还有《鹑鸽谱》和《百种牡丹谱》等。蒋廷锡的这套《鸟谱》深得皇室尤其是雅好书画的乾隆皇帝喜爱，命将它藏入紫禁城东六宫区内的御书房内，以便随时观览。

《鸟谱》的临摹者张为邦、余省是乾隆朝如意馆的职业画家。张为邦，一作维邦，其生卒年不详，江苏广陵（今扬州）人。其父张震，字文远，号扶旭，画猫狗名重一时，并工绘山水、楼阁及花鸟，康熙年间，以画艺称旨在中供职。张为邦自幼受家学的影响，亦工于绘画，尤擅画人

物、楼观、花卉等。在张震的引荐下，他亦进到宫中，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其入宫的具体时间，目前没有明确的资料。通过检索《清档》可知，张为邦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雍正四年(1726)《清档》之“流水档”和“记事录”中。这一年的四月，张为邦因为画作令怡亲王满意而受到重奖，档文记：“二十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内管领穆森奉怡亲王谕：将造办处库内收贮我的银子，赏给画画人张为邦银三十两。遵此。”^[18]由此可知，张为邦至迟在雍正四年已在宫中任职了。张为邦曾受乾隆皇帝的旨意，随西洋画师郎世宁学习油画。乾隆元年(1736)《清档·记事录》记：九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内大臣海望拟赏西洋人郎世宁，画画人戴正、张为邦、丁观鹏、王幼学。钦此。于本月二十七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内大臣海望谨拟得赏西洋人郎世宁上用缎二匹、貂皮二张，郎世宁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缎一匹折片一件，交太监毛团、胡世杰转奏。奉旨：准奏。钦此”^[19]。由此而知，张为邦早在乾隆元年或者之前已成为郎世宁的弟子了，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之一。由于他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因此，很快便掌握了基本的技法，能够单独地承旨绘制油画，《清档·如意馆》记：乾隆三年(1738)四月十五日，“太监毛团传旨：含韵斋着张为邦等画鱼缸荷花、牡丹桶绢画二张；再将墙壁上所糊油纸俱画油画。钦此”^[20]。又记：乾隆四年(1739)，张为邦承旨为圆明园内的韶景轩画油画，“太监毛团传旨：韶景轩东北角牌插壁子上外面，着糊油纸，令张为邦等画油画。钦此”^[21]。同年，张为邦与同在启祥宫画画的西洋画家王致诚，承旨“各自画油画几张”^[22]。张为邦的油画水平，由故宫博物院所藏他于乾隆八年(1743)绘制的《岁朝图》轴，可见一斑。此图从构图到用笔均借鉴西洋画法，同欧洲的静物画有相似之处。器物造型准确，通过明暗变化

以及高光的处理，将器物的质感表现得逼真写实，显示出画家的写实功底深厚，对西洋技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中西画法兼备，又妙于工细写实，这应该是乾隆皇帝决定任用张为邦来画《鸟谱》的重要原因。

张为邦是何时离开宫廷的，没有明确的记载，应该是在《鸟谱》绘制完成后的当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这一年张为邦还和郎世宁合作绘制了崇庆皇太后的“御容”，此后便不再有他在宫廷中继续承旨绘画的记载了。

张为邦之子张廷彦(约活动于1725—1771)，乾隆九年(1744)在张为邦的荐举下，亦以擅绘人物、山水及界画而入宫，张家由此而成为祖孙三代先后在宫中供职的绘画世家。

余省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其父余珣潜心于画学，有一定的造诣。余省和弟弟余穉自幼在其教诲下，工于花鸟写生，以笔法工致细腻、造型传神生动、设色清丽古秀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余省二十余岁时与余穉同至京城，与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等权贵结交，每每挥毫作画，乐不思乡。

乾隆二年(1737)，四十六岁的余省被海望力荐入宫，从此在咸安宫画画处供职。此事见载于乾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清档·记事录》：“内大臣海望将画画人余省、周鲲、余穉三人恭画绢画六副(幅)并伊等职名缮写折片，交太监毛团等转奏。奉旨：着令此三人在咸安宫画画处行走。钦此。”^[23]

余省自入宫伊始，其造型准确而富于生趣的花鸟虫鱼画，就颇受乾隆皇帝的赏识。这从他初入宫时“每月赏给钱粮八两”的高额酬薪上可见一斑。乾隆二年(1737)七月十二日《清档·记事录》记：“太监胡世杰、高玉传旨：着传与海望，将画画柏唐阿王幼学除所食二两钱粮，再新来画

[1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册，页761。

[19]《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204。

[20]《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页213。

[2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9册，页168。

[2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9册，页172。

[23]《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784。

[2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784。

[25] 见乾隆元年的《清档·买办杂项库票》记：“画院处为领十一月分钱粮人：陈枚、孙祜、戴洪、金玠、金昆、卢湛、程志道、吴械、吴桂、叶履丰、戴正、张为邦、丁观鹏、徐焘共十四人，每人银拾一两，共银一百五十四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页557。

[26]《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600。

[27]《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页784。

[2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页304。

[29]《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页670。

[30]《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页685。

[3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页676。

[32]（清）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三册，页2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33]《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页305。

画人余省、余穉、周鲲等三名，每名每月赏给钱粮八两。

钦此。”^[24]当时，从雍正朝开始就在宫中任职的老画家陈枚、孙祜等人的钱粮也不过十一两^[25]。余省享有的“八两”待遇与新来的画家相比，亦属于高者。《清档·如意馆》记方琮于乾隆十七年（1752）初入宫时，“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工食银三两”^[26]，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清档·杂录》记：“新来南匠金廷标（同）方琮一样，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公费银三两。”^[27]

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体现在画家的等级划分上。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依照其个人的审美喜好，给在宫中任职的十五位画家划分了三个等级。余省入宫虽然比张为邦晚，但是，他的画艺与张为邦相比，更被乾隆皇帝所欣赏，因此，乾隆皇帝将余省列为一等画家，张为邦列为二等画家。见七月八日《清档·记事录》记：“太监高玉传旨：画院处画画人等次，金昆、孙祜、丁观鹏、张雨森、余省、周鲲等六人一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吴桂、余穉、程志道、张为邦等四人二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六两、公费银三两；戴洪、卢湛、吴械、戴正、徐焘等五人三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钦此。”^[28]

乾隆皇帝对余省画艺的赏识还体现在对其画作的重视上，如常谕令将余省的作品列为“头等”来收藏。乾隆七年（1742）二月十九日《清档·裱作》记：“太监高玉等交余省《茶竹雀兔》手卷绢画一张，传旨：着表（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配囊，入乾清宫头等。钦此。”又记：三月初十日，“太监高玉等交俞（余）省绢画《鱼》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入乾清宫头等。钦此”^[30]。再记：四月二十三日，太监高玉“交余省《四季梅花》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刻字，入乾清宫头等。钦

此”^[31]。等等。

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见于题画诗中，他不仅对余省每画必题，以示对该画的重视和喜爱，而且在题余省《花雉图》轴中，直接表露出对余省画作的赞赏之情，言：“法常写生擅流辈，草草但取无人态。徐黄胶粉复太工，院本习气刻楮同。余省权衡得其中，理趣神解参无穷。”^[32]法常是南宋著名画僧，以笔墨萧散虚和著称；“徐黄”是指五代时期分别代表野逸和富贵风格的花鸟画家徐熙与黄筌。乾隆皇帝认为他们的画作各有得失，唯有余省能达到“理趣神解参无穷”的境界。

乾隆皇帝出于对余省画作的高度赏识和信任，还曾谕令余省替其画作染色。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十三日《清档·如意馆》记：“太监胡世杰交御笔画一轴，传旨着余省烘染颜色。钦此。（本日烘染完，交讫。）”^[33]此举，对于地位低下的职业画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荣耀。查《清档》，乾隆朝仅有余省获得过此项殊荣。

最终，余省有三十七幅画作被著录到清皇室的《石渠宝笈》中，其被收录数量之多，在宫廷的职业画家中实属少见，从中印证了乾隆皇帝对余省画作的赏识非同一般。

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余省向皇室提出回乡“展视父母坟茔”的请求。此事见该年九月《清档·杂录》，记：“二十九日造办处谨奏为请旨事：据画画人余省呈称，伊父母坟茔滨河近水。去年接家信知有水冲之处，告假回籍展视，稍尽乌私，暂假数月即赴京应役，以尽犬马之力等因具呈。查从前南匠王澍告假归省，曾经奏准，给假十个月在案。今俞（余）省告假展视坟茔，请照例准假十个月，假满即令伊作速来京应役，可也？为此谨奏请旨于本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34]最终，余省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但是他对皇室“暂假数月即赴京应役”的承诺并没

有兑现，自乾隆二十二年年底以后的《清档》中，再也未见到有关余省承旨创作的记载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年底，应该是余省离开宫廷的最后日子，这一年，他六十六岁。余省大约在十年之后于家乡病逝。

三 《鸟谱》的内容

《鸟谱》在内容安排上，有意将同类鸟绘于同一本图册中，以便于对某一类鸟的全面把握。但是由于每本图册的开数是固定的，而每类禽鸟的数目不同，于是出现了将几类鸟合并同一册，或者是以某一类鸟为主，再附加上其他鸟类的组合。如第五册以啄木鸟为主，在绘有白头、黑头、花翎等啄木鸟之外，附加有石燕、越燕、紫燕、贴树皮、王冈哥、火纹斑、刺毛鹰、戴胜、吐绶鸡、白鹇等其他类的鸟。又如第六册以各种鸡为主，除绘有丹雄鸡、黑雌鸡、翻毛鸡、莱鸡、越鸡、秦和鸡、广东鸡、洋鸡、金钱鸡、山花鸡等之外，又附加有麻雀、半翅等。第七册是以鹅、雁和鸭三类组成，鹅有花鹅、白鹅、凤头鹅、金头天鹅、黑嘴天鹅、红嘴天鹅等；雁有黄杓雁、小黄杓雁、茶雁、秦雁、白雁等；鸭有绿头鸭、麻鸭、黑鸭、凤头罗纹鸭等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品种。由于受每册绘三十开的制约，有些动物不得不跨册。如鸭，除绘于第七册外，也绘在了第八册，它们是尖尾罗纹鸭、马鸭、鱼鸭、黑脚鸭、蒲鸭等等。第十二册是《鸟谱》的最后一册，因此，所绘鸟的种类略杂，应该是对各册遗漏鸟的一个补充，里边除绘有鹰，即白超、黑超外，还绘有雀，如麻叶雀、仔仔黑、虎头雀，同时，绘有红交嘴、黄交嘴、花交嘴，以及国公鸟、信鸟、提壶鸟、额摩鸟等近十个品种。

乾隆皇帝谕令余省、张为邦共同摹绘的这套蒋廷锡《鸟谱》，实际上并不是对蒋氏画作的简单临摹，而是从表

现对象到文字内容都作了增减修正。

目前，蒋廷锡的《鸟谱》下落不明，仅见载于《石渠宝笈》的著录：“素绢本，著色画，每册凡三十幅。左方别幅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蒋廷锡恭画’。下有‘臣廷锡’‘朝朝染翰’二印。共计三百六十幅。”^[35]余省、张为邦《鸟谱》的数量，除后来补绘的额摩鸟外，亦是三百六十幅，与蒋氏的相同。但是，通过翻检《清档》发现，余省、张为邦在对蒋氏《鸟谱》仿制的过程中，不断按旨意加进新的内容。如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清档·如意馆》记：“十四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事总管王常贵交来《鸟谱》图样三十张，传旨着余省画得时聚在蒋廷锡画鸟谱后。钦此。”^[36]有增必有减，由此可推断，余省、张为邦对蒋氏的原作进行了删减，从而保持了画作“三百六十幅”总数的不变，至于增和减的具体名目，由于蒋氏《鸟谱》的遗失而无法比对。同样无法进行比对的还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等人在文字内容上的修订，他们对鸟名、产地、习性等重新做了核实，正如在尾跋中所言：“凡名之讹者、音之舛者，悉于幾馀披阅举示。复详勘厘正，并识其始末。”

四 《鸟谱》的创作

画“谱”最先是中国古代绘画的著录形式。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徽宗赵佶将内府所藏历代画作编辑成书，名为《宣和画谱》，画“谱”一词始见于此。该书所录画家及其作品皆凭借文字记载而还没有借助图像。直至南宋宋伯仁编著的描绘梅花多种形貌的画本《梅花喜神谱》出现，画谱的表现范畴扩大到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这种形式也构成了此后画谱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由于编辑主旨、选材对象的不同，又衍生出多样的画谱类型：

[3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页795。

[35]（清）张照等撰：《石渠宝笈》。

[36]《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页329。

[37]《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页652。

[3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页301。

[39]《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351。

[40]《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664。

[4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593。

[4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602。

[43]《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599。

[4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599。

[4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8册，页609。

[46]《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9册，页501。

[47]《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9册，页558。

[4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页92。

[49]《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9册，页576。

[50]《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9册，页568。

[5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页361。

[5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页580。

既有作为传习样本的技法汇编，也有某一画家群体的作品合集；既有某种特定题材的集中展示，也有反映自然万象的博物图录等。此套《鸟谱》则是属于集中展示某种特定题材的画谱。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清档·如意馆》记：“初二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奉旨：《鸟谱》下函四册著张为邦用白绢画。钦此。”^[37]由此而知，张为邦独自绘制了《鸟谱》的后四册，至于张为邦是否也参与了前八册的绘制则不得而知。由于此套《鸟谱》是对蒋氏《鸟谱》的临摹，因此，余省和张为邦在绘制的过程中都要遵从蒋氏的画风，于是这本出自两位画家之手的《鸟谱》，画风统一，如出一辙。

余省和张为邦都是以工笔重彩技法、连绵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塑造鸟禽形貌，又以短细的笔触，一丝不苟地刻画出鸟禽背部坚密光滑、腹部蓬松柔软的毛羽质感。为了增强其真实性和立体感，又巧妙地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影技法，以深浅不同的色调，表现出羽毛或厚重或轻薄的视觉效果，并通过对高光部位的强调而渲染出鸟儿明亮的眼睛。作为衬景的花草、树木，以清代花鸟画坛最为盛行的恽寿平“没骨法”表现。这些点景的花、木虽然所占画幅的比例较小，但是，它们巧妙得体的穿插、陪衬，为画面增添了生态空间的真实感，从而使鸟儿们在田间溪畔、树柯草丛间的行止饮啄、翻滚飞翔、剔爪梳翎的各种体态，显得更富有活力和情趣。

《清档》显示，余省和张为邦在绘制《鸟谱》期间，还承担着宫中其他的绘画任务。比如，《清档·画院处》记：余省在乾隆十六年（1751）闰五月二十六日，承旨为“蓬岛瑶台海色初霞东二次间画窗户心斗方十三幅”^[38]；六月初八日，承旨为“双鹤斋茝荷深处东近间北板壁绘大幅贴落”^[39]；十月十三日，与丁观鹏、张宗苍、姚文瀚合作，为“秀清村

西里间东西曲尺墙画大画二张”^[40]；十月十八日，承旨画“《鱼虫》册页一册”^[41]。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十六日，承旨在“新、旧宣纸上画各色花卉，共二十张”^[42]；三月十七日，承旨为“三家店行宫、雍和宫与天游西里间西墙画挂轴”^[43]；三月二十四日，承旨为“怀清芬画剔墨花卉挂屏”^[44]；五月十五日，承旨为“慎修思永和韶景轩画手卷二卷”^[45]。

余省最繁忙的一年要数乾隆十八年（1753），他曾不断地承旨创作。如《清档》记：五月二十日员外郎白世秀交来御制诗十八首，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余省照诗意起雕刻花卉细稿十八张。钦此。”^[46]同一天，白世秀又交古镜十六面。胡世杰传旨：“着余省照镜背后花样画镜谱册页十六幅。钦此。”^[47]七月十四日，胡世杰传旨：“大楠木插屏抽屉内，着余省、丁观鹏、张宗苍分画。钦此。”^[48]七月二十九日，胡世杰传旨：御笔宣纸手卷一张，“着余省照旧手卷上花样用泥金画龙九条。钦此。于十月三十日，太监董五经持来宣纸十九张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养性斋等处画门十九张，着余省画。钦此。”^[49]八月初一日，胡世杰交新宣纸七张，传旨：“着余省画写意花卉六张，着张宗苍画山水一张，都要快些画。钦此。”^[50]十月十九日，胡世杰传旨：“热河行宫内用画十张，着照纸边上所写地方，余省画四张，徐扬画六张。钦此。”^[51]等等。

张为邦与余省一样，在绘制《鸟谱》之外，也承担着其他的绘画任务。不过他与余省相比，其任务量要小得多，相关的记载在《清档》中仅见四五条。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见两条，《如意馆》记：十二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后虎座着张为邦、方琮用绢画百鹿图。钦此”^[52]。同年同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交牛鹿图挂轴一轴，传旨着将挂轴上牛鹿剥下，背面着张为邦照样画

牛鹿一张……”^[53] 乾隆二十三年(1758)见一条,如意馆四月二十日档文记:“本日太监胡世杰交木片一面油画虎一件,传旨着张为邦配画油画一面。”^[54]乾隆二十四年(1759)见一条,如意馆二月档文记:“本月十一日首领桂元交白绢大小十六块,传旨正谊明道灯屏一座二面,用画片十二块、绦环四块,着徐扬、张为邦、方琮、金廷标、王炳、陈士俊每人画二张。钦此。”^[54]等等。

五 《鸟谱》的题跋

余省与张为邦合摹的《鸟谱》与一般的绘画作品不同,它在绘成后,是先交与军机处,而后再由军机处分批交与裱作装裱成册的。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清档·如意馆》记:“十三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九十幅、绢字图说九十幅,传旨着交如意馆表(裱)册页。钦此。”^[55]又记:“(八月)十四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二百一十张、绢字图说二百一十张,传旨着将《鸟谱》裱册页七册。”^[56]

军机处,其前身是康熙朝的南书房,雍正朝改为军机处,担负了一切重大事务的管理与指挥。乾隆朝时,其以“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的职能,成为清政府中最核心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全部由外戚望族及皇帝的亲臣、重臣组成,如为《鸟谱》写对题的傅恒、刘统勋、兆惠、阿桂等人。傅恒(?—1770),字春和,镶黄旗人,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的弟弟,在乾隆朝时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在军机处二十余年,长期为乾隆皇帝所倚重。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一字仲常,号耐圃。乾隆二年(1737)状元。历任兵、刑、户部侍郎或尚书,方略馆副总裁,《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等要职,堪称乾隆时力秉钧轴的重臣之一,在军机处任职亦二十余

年。刘统勋(1698—1773),字延清,号尔钝,高密县(今属山东)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授编修,乾隆年间累官至刑部、工部、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等。兆惠(1708—1764),字和甫,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九年(1731),以笔帖式授军机章京。历任兵部郎中、内阁学士、盛京刑部侍郎、刑部右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擢协办大学士兼领刑部尚书。阿桂(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满洲正蓝旗人,后以新疆战功抬入正白旗。长期戍守西北边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乾隆皇帝谕令这些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军机大臣们来为余、张《鸟谱》写对题,显然,该《鸟谱》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蒋氏《鸟谱》的复制,它除了具有观赏性外,可能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起码它可作为供乾隆皇帝及皇室了解各地区鸟类的物种、名称、生理特征、栖息环境、迁徙、繁殖习性、育雏行为等的一种博物图志,即如傅恒尾跋所言:“洵足为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矣。”乾隆二十八年(1763),即《鸟谱》绘成后的二年,尚书阿桂从伊犁捕获一只大鸟。乾隆皇帝从未见过此鸟,于是询问其名,无人能答,有的臣子就提出查《鸟谱》,找出与之相近的鸟,而后定名。对此,乾隆皇帝在《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特记:“尚书阿桂还自伊犁,以所获鹭鸶尔鸟进,色正黝尾,中散白点如雪糝。赤睛黄匡,翎戢戢半雉扇。然询其名既无义可索,或请按《鸟谱》近似者当之。”^[57]

乾隆皇帝敕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兆惠等八人对每一帧上的鸟禽加以详细注释,释文不仅要用通行的汉文,还要用被视为“国语”的满文。同时,释文不能照抄蒋廷锡《鸟谱》原有的内容,而是要重新对鸟名、产地、习性等进行核实。为此,傅恒等人在尾跋中言:“凡名之讹者、音

[53]《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页583。

[5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3册,页450。

[5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页662。

[56]《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册,页708。

[57]《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册,页720。

[58] 清傅恒、刘统勋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0月。